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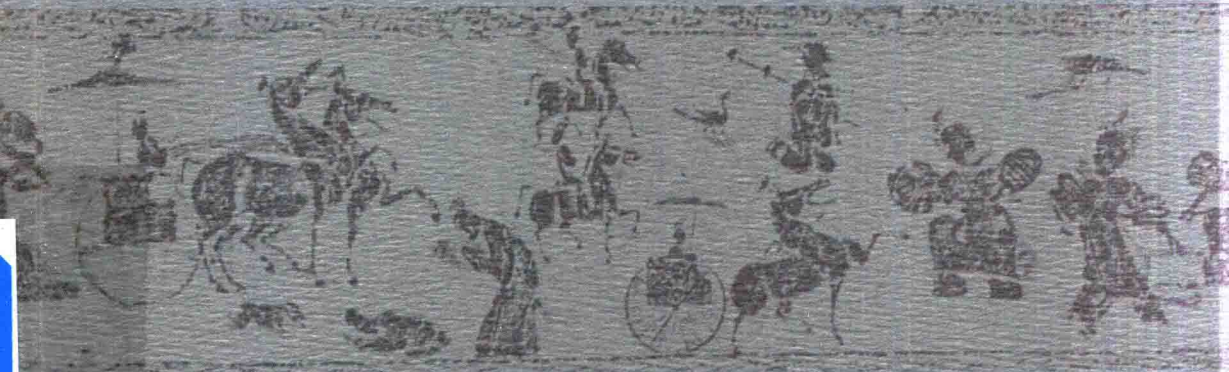


东汉文化研究丛书
湖北省东汉文化研究会编

东汉史研究

赵国华 主编

A Study o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istory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东汉文化研究丛书
湖北省东汉文化研究会编

东汉史研究

赵国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汉史研究/赵国华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216-09025-4

I. 东… II. 赵… III. 中国历史—研究—东汉时代 IV. K234.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5712号

责任部门:重点图书分社

责任编辑:尚晓梅

封面设计:张弦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王铁兵

东汉史研究 DONGHANSHI YANJIU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邮编:430070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22千字

插页:2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16-09025-4

定价:48.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本书出版承蒙
第十届世刘大会筹委会和武汉市东汉刘氏食品商贸公司
提供资助

东汉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宝林

主任：赵国华

编纂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尤学工 向德忠 刘家国 刘耀西

张 功 赵国华 夏日新 郭 杰

前 言

赵国华

近三十多年来的秦汉史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秦史研究成果丰硕,西汉史研究建树颇多,东汉史研究相对薄弱。东汉史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历史人物等方面,仍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就。

东汉时期的政治制度,大体上承袭西汉王朝,也有一定的兴衰嬗替。许多学者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三公、尚书、侍中的职权,认为三公有较大的职权,尚书台并非众务所归,可以说是三公、尚书共掌宰相职能;侍中的职守是文谋和武卫,外戚侍中窃弄皇权,儒者侍中维护皇权。也有学者分析重大政治现象,认为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外戚代表世家豪族,宦官代表皇权,官僚士大夫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众的要求。但论及张鲁政权的性质,究竟是农民革命政权,还是封建割据政权,曾经有过不同的解释。还有学者关注汉末政局,认为董卓集团的失败主要出于内部而非外部因素,是并凉两州军队矛盾激化的结果。此外,对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监狱制度、监察制度等问题,也都有较深入的探讨。

有关汉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曾把学界的焦点吸引到东汉社会性质研究上来,引起“封建制说”和“奴隶制说”的争议。但随着社会形态学说逐渐地淡出史学领域,广大学者开始转向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研究,或认为东汉时期已形成综合经营的庄园经济结构,并且成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基本经济单位;或认为东汉时期

未形成庄园经济制度,普遍存在的只是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两种经济形式下的自然经济结构;或着眼于新型生产工具的推广应用、劳动力的调配和各类生产的管理,认为庄园经营模式都有比个体经营进步的地方;或重新考察门阀士族阶层,认为它是以庄园经济为物质基础,以对国家权力的支配为政治条件,以门第观念为思想意识,最终形成于东汉时期。有些学者分析刘秀的“度田”,或认为是一场失败的行动,或认为是一项成功的措施,这两种认识迥然不同。也有学者注重经济发展水平,认为东汉商业经济并不是迟滞不前,而是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得到普遍的发展,由此造成了一股追商逐利的社会风气。还有学者关注东汉时期的人口、性别和户籍及自然灾害问题,认为东汉人口的增减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增长,后一阶段人口锐减,人口的增减与社会的稳定程度密切相关;东汉王朝面对各种自然灾害,能够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采取多种防灾和赈灾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救助效果。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东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许多学者考察《太平经》与道教的关系,认为《太平经》继承和改造了汉代流行的元气思想,构成了早期道教独特的理论体系。但有学者认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作为民间宗教,是以《老子》为圭臬,而不是以《太平经》为经典;或认为《太平经》对原始道教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民间流行的巫术与原始道教的关系更近。也有学者透视白虎观会议,认为它弥缝了今古文经学之间的裂痕,造就了一大批忠孝仁义之士,维护了东汉政权的基础;或认为《白虎通》的神学思想承继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直接出自汉代的讖纬神学。还有学者考察东汉私学和鸿都门学,认为东汉私学的广泛性既是教育进步的产物,又是经学发展的结果;鸿都门学作为一个文化场所,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学校,把鸿都门生当作王符、仲长统的对立面,视为东汉思想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此外,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以其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一次文化复兴运动。

为了应对严峻的边疆问题,东汉王朝设置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职位,负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许多学者依据具体

史实,探讨了这些官职的设置情况、职权及其特殊作用。羌人暴动的原因究竟是羌族政策的失误,抑或地方政府的失策,还是羌族首领的图谋?羌人暴动的性质究竟是反抗压迫的起义,还是制造分裂的骚乱?这些问题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也有学者关注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认为东汉王朝由于国势不振和政治中心东移,对西北边疆采取消极防御、被动退守政策,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还有学者认为马援南征得到了岭南和交阯人民的支持,在军事行动中坚持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维护了中原与南洋、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或者关注中外关系的发展,论及东汉王朝与贵霜、大秦诸国的关系,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历史人物研究作为东汉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包括群体研究和个人研究两方面。在群体研究方面,较受重视的对象包括外戚、宦官、党人、儒生、隐士及世家大族、汝颖名士,有学者认为东汉宦官作为皇帝的“家庭奴隶”,不担任外朝官,权力有限,其中忠于朝廷、有功国家的比比皆是,不应一概加以贬斥;或认为汝颖名士形成的政治背景是反抗外戚宦官带来的黑暗政治,其文化基础则是反对虚伪追求真实的执着精神,这一群体对人性自然与儒道融合新型人格的向往,成为魏晋玄学思潮兴起的出发点。在个人研究方面,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军事家马援和班超,史学家班彪、班固和荀悦,思想家桓谭、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科学家张衡和张仲景,经学家马融、郑玄和何休,文字学家许慎,艺术家蔡邕等人,都受到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刘秀研究,出版了多部传记作品,刊发了大量学术论文,涉及刘秀的家族背景、个人品格、军事才能、治国方略、领导艺术诸层面,学术成就最为突出。

这些学术成就的取得,凝聚着广大学者的智慧,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然囿于秦汉史研究的习惯性,我们通常把东汉视为西汉的延续,甚至当作西汉的“尾巴”,因而关注东汉史的程度,似乎不如对西汉史的关注。这样一来,东汉史研究就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存在着诸多缺陷。从研究内容来看,个别的、具体的研究较多,整体的、抽象的探讨较少;就研究方法而言,微观的、叙述的研究较多,宏观的、思辨的探讨较少。特别是迄今为止,仍在论证东汉断代史研究的可能性,未能给社会送上一部东汉通史,更让学界同侪心存遗憾。因此,加强东汉史研究的

呼声,近些年来可谓愈益强烈,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

怎样加强东汉史研究?依笔者之见,首先要对东汉史有一个通盘认识。以往我们纵向考察东汉史,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光武、明、章诸帝为前期,处于恢复和发展的状态;和帝以后为后期,沦入黑暗腐败的局面。然而,东汉一代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和帝以后的历史又相当复杂,这样解释太笼统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王云度先生曾从政治、经济、阶级诸层面入手,讨论东汉史的分期问题,把东汉史分为前、中、后、晚四个阶段,惜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笔者以为,东汉史可分为五个时段:光武是政权重建时段,明和是稳定发展时段,安顺是急剧转折时段,桓灵是衰颓败坏时段,献帝是名存实亡时段。这五个时段前后衔接,即从光武之兴、明和之治到桓灵之衰、献帝之亡,恰成一个王朝的兴亡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史研究堪称一个王朝史的认识标本。

其次,要深入探讨东汉史上的重大问题。以往我们研究东汉史,已讨论过许多重大问题,并对有些问题达成共识,但就整个东汉史而言,仍有不少问题亟须深入探讨。如论“光武中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即从军人政权向文官政府过渡。东汉王朝仅在光武一朝就实现了这一转变,而在别的王朝完成这一转变,通常要历经三四代皇帝。这种过渡是一个政权能否稳固的政治基础,自古及今概莫能外。如论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主要是在安顺时期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持续不断的羌人暴动带来严峻的边疆危机,统治集团的恶性内耗损伤整个国家机器,加上安顺二帝的昏庸无能使朝廷政治日渐颓败。如论“清议”演化成“党锢”,应该是一个政治矛盾激化的过程,从杨震之死到李固、杜乔之死,再到两次党锢之祸,正是一个从个人谏诤到群体抗争的过程。如论外戚宦官专权,既要看到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又要看到外戚与宦官之间的合作,还要看到外戚与外戚、宦官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更要看到外戚宦官专权与君主专制的关系。

再次,要系统整理东汉史研究的成果。东汉史研究从班固修撰国史算起,已有近两千年的时间,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汉前期至南朝是历史编纂阶段,南朝

至晚清是历史文献整理阶段,晚清至今是历史问题研究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张璠、袁宏、范曄等人的《后汉书》、《后汉纪》相继问世,为东汉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第二个阶段,李贤、刘敞、惠栋、王先谦等人对《后汉书》进行注释、解说、校勘和考证,为东汉史研究铺平了道路。在第三个阶段,东汉史研究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展开,在国内外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涌现出一大批学术论著。今天我们研究东汉史,就必须超越时空的局限,总结近两千年的学术历程,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构筑一个新的认识体系。

复次,要充分利用东汉史的基本资料。以往我们研究东汉史,主要依靠有限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范曄的《后汉书》。虽有袁宏的《后汉纪》,且较范曄的《后汉书》成书早七十年,却常被一些学者忽略。虽有历代学者整理《后汉书》的论著,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没有被充分利用。虽有较为专业的汉画学会,以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为研究对象,却与秦汉史研究会缺少合作。所以,今天我们研究东汉史,必须尽可能占有相关史料,无论是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还是画像砖石、碑刻、壁画及其他文物资料,都应该加以整理和利用。

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把模糊的历史梳理清楚,把错误的认识纠正过来,也就是不断地补偏救弊。我们进一步开展东汉史研究,就应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加系统和细致的探讨,以期全面和深入地认识东汉史,给社会送上一部东汉通史。

目录

上 前 编 言

赵国华

刘秀论

马植杰 / 3

马援楼船军击交阯九真与刘秀的南海经略

王子今 / 17

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

孙家洲 / 29

论刘秀罢兵的几个问题

臧知非 / 49

刘秀『度田』史实考论

曹金华 / 64

刘秀刘永争霸中的地理因素

张 功 / 79

刘秀开国功臣群体研究

赵庆伟 / 91

刘秀『度田』散论——东汉户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

袁延胜 / 110

薄太后『配食』高庙与光武晚年政局

张小锋 / 134

下编

东汉制度渊源考述

卜宪群 / 147

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

张鹤泉 / 164

东汉碑刻与讖纬神学

吕宗力 / 178

东汉对西羌长期作战的原因与教训

赵明 / 211

人代冥灭 清音独远——《古诗十九首》艺术表现论

阮忠 / 227

东汉孝子图的文献价值

黄宛峰 / 241

略论东汉士大夫的缺失

张保同 / 255

论《太平经》的史学思想

郑先兴 / 267

汉末张鲁政权与五斗米道

夏日新 / 291

附录

新时期汉光武帝研究综述

叶秋菊
王奕鹏 / 301

编后记

上編



刘秀论

马植杰

应该怎样评价刘秀？人们对他总是贬多褒少，无论在大中学教科书中，或者各种报刊上，一提到刘秀，人们就说他是大地主、大豪强、大粮商，说他在新末农民革命的浪潮中混进了起义队伍，靠着耍阴谋、搞分裂，窃取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并说东汉政权一开始就代表着豪强大族的利益。以上讲法是否都符合历史的实际？刘秀在农民战争中的表现和作用究竟怎样？他在统一后所采取的措施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利？对他这样的封建帝王应该怎样评价？这些问题都有深入地加以探讨的必要，现将我个人的看法陈述于后，诚恳地希望同志们指教。

一、刘秀的出身及其在农民战争中的表现和作用

刘秀，字文叔，南阳舂陵（今湖北枣阳）人，是汉高祖八世孙，根据史籍记载，刘秀的家庭并不像很大的豪族。刘秀当初到长安受《尚书》时，曾经“资用乏”^①，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富裕。刘秀早年曾经到邻近的新野县去，听说阴丽华长得很美丽，心中十分爱慕，所谓“娶妻当得阴丽华”，就是他的两大志愿之一。可是一直到了公元23年6月，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以后，才把阴丽华娶来。说明他原来的家境和势力并不是很雄厚的。刘秀刚起兵时，连一匹马都没有，只能骑牛，说明他不阔绰。论家庭凭借和社会势力，在当时崛起的群雄中，他并不比一些人

^①《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

强。他虽然是汉朝宗室，但其父、叔只做过县令一类的低级官吏。当时刘姓宗室已经超过“十有余万人”^①，遍布各地，像刘秀这样连封爵都没有的普通地主也算不上什么显赫门第。史书上说刘秀“性勤于稼穡，而兄伯升（刘缤字）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②“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③“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④许多人根据以上材料，说刘秀是大地主、大商人。他们说：“在饥荒年岁，别人都挨着饿，刘秀家还有余粮可卖，若非大地主，岂能如此。”联系书中上下文，刘秀所以卖谷，是因为他到新野避吏，需要生活费用，不一定是余粮甚多。更不能因为他卖过一次粮食，就说他是大粮商或大商人。在封建时代，连一次买卖都不做的地主是很少的。刘秀早年在长安游学时，曾经同别人合钱买驴出赁，难道能说他是小商人吗？史书上既然说到刘秀亲自经营田业，表明他家不是很大的地主，一个很大的地主是不大可能亲自管理生产作业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刘秀早年注意生产和熟悉农事，所以他建立政权以后，知道“稼穡艰难”，因而对于农民生计和勤俭持政比较重视。这种经历恰恰是刘秀日后在军事、政治上能够成功的有利因素。

公元 17 年，刘秀家乡所在的荆州地区爆发了绿林军大起义。公元 22 年，刘缤、刘秀兄弟以及他们的亲友也趁机起兵反对王莽。他们很快与绿林军汇合在一起。从史实上看，绿林军之所以发动起义，乃是为饥寒所迫，起义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反对新莽官军的行动也不积极，他们打败了荆州牧的二万军队，并且截获了荆州牧，可是却“不敢杀牧”^⑤，夺取了几个县城，也不派遣队伍把守，仍旧退回绿林山中。可是等到刘缤、刘秀等参加起义队伍以后，起义军便开始连续不断地攻城略地，不仅杀死了王莽的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还消灭了王莽派来镇压的官军严尤、陈茂部。这个转变显然是积极的。据《汉书·王莽传》：

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讫无文号旌旗表识……严尤曰：

①《汉书》卷十二《平帝纪》，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②《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③《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注引《东观记》。

④《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⑤《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注引《续汉书》。

“……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说，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

可见刘缤、刘秀兄弟参加起义以后，确实使农民军的反莽斗争强化和振作起来，以致引起了王莽的恐惧。有些同志认为绿林军之所以立一个刘姓人为皇帝，是由于刘缤、刘秀兄弟从中作祟。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资治通鉴》卷三十九载：

舂陵戴侯曾孙玄在平林兵中，号更始将军，时汉兵已十余万，诸将议以兵多而无所统一，欲立刘氏以从人望。南阳豪杰及王常等皆欲立刘缤，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缤威明，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

可知立刘姓皇帝并非刘秀兄弟所倡议。在当时正统思想弥漫下，立汉朝宗室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方面，刘秀本人并没有任何责任。假若刘缤、刘秀不参加起义队伍，绿林军照样会立刘玄为皇帝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衡量一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既不是他的出身，也不是他对自己的表白，而是看他的实际表现和客观作用。尽人皆知，农民军在昆阳的胜利，是王莽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战役，而刘秀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第一，在战斗前，王莽派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带领四十二万大军前来镇压。农民军将领退守昆阳，他们面临强大敌人，十分恐惧，怕再见不到自己的妻子儿女，打算往其他几个县城疏散，刘秀批驳了他们的意见，认为只有集中兵力、坚守昆阳，不能分散力量，让敌人各个击破。第二，诸将平时看不起刘秀，但在万分急迫之下，都慌了手脚，只好向刘秀请教。刘秀令王凤、王常守城，自己和宗佻、李轶出城收兵，准备把郾、定陵各营的队伍都调到昆阳这方面来。他这样从容不迫、指挥若定，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第三，各营兵力调集好以后，诸将又贪惜财物，打算分兵把守，刘秀说：“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